

文化差异下的幼儿园

——解读《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赵莉玉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三门峡 472000

【摘要】《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一书进一步揭示了中、美、日三国学前教育 20 多年来的变化。历经了 20 多年的发展,中国幼儿园在硬件设施、教师角色、儿童观、游戏、师幼关系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与世界学前教育发展趋势接轨的同时,一些曾经招致西方同行质疑与批评的中国幼儿园特色并未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或消失,反而得以保留和传承。这些变化与传承表明,每个国家的教育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背景,当今中国学前教育界在学习西方教育理念的同时更应立足于本国文化的实际,以使学前教育中值得保留的文化观念和实践经验得以继续传承。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文化;学前教育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一书于 2014 年出版,它是《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20 年后的后续研究,研究者对中、美、日三国幼儿园进行了新的探索,两者都是比较研究而形成的报告,在国际教育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研究者所表达的核心观点是:“文化是社会生活赖以持续的根源,也是制约全球化、经济变化等多方影响的关键因素。幼儿园作为社会机构,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既反映文化,又辅助文化的持久传承。”薛焯教授认为,“文化是一个意义体系”,“文化实践中的各种观念、做法都是互相联系、互为支持的一个连贯系统”,“幼儿教育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

1 关于《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

两个研究中,作者都选用“录像”记录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也就是通过拍摄幼儿园一日活动,然后请相关教师来看录像,并解释他在当时状态下的想法和做法。同时,为了了解老师的真实想法,也对老师们进行访谈。新的跨文化研究除了跨越地域和文化外,还增加了新的描述角度——纵向的时间跨度,对 20 年后幼儿园的变化进行描述。基于此,研究者在中、美、日三个国家分别选择了两所幼儿园来进行拍摄,在中国,需要进行回访的研究对象是云南省的昆明“东风幼儿园”(现在改名为“大观幼儿园”),同时又在上海选择了一个新幼儿园——“思南路幼儿园”,作为研究对象来进行对比,两所幼儿园中,都进行一日生活的拍摄来记录。

《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提出了新的问题,并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那就是中、美、日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幼儿园是如何发展的,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原因是什么。上海的学前教育有很多新的理念,教育模式也很新,“大观幼儿园”20 年中变化很多,但仍保留有自己鲜明、独特的特点。有人可能会质疑为什么会选择上海的“思南路幼儿园”,它能代表中国幼儿园发展的现状吗?然而这不是主要目的,研究者主要想通过录像,请被访谈者讲解一下他们在观看待思南路幼儿园的一天时,有哪些自己的看法,通过被访谈者对录像中幼儿和教师行为的解读,来获得研究者需要收集的资料。

2 中国学前教育发生的变化

2.1 幼儿园硬件设施:由落后、陈旧走向现代、更新

20 世纪 80 年代,昆明“东风幼儿园”是一栋 6 间砖制的旧厂房,园方以此作为教学楼。园内的硬件设施比较落后、园所环境也相对单调无趣。卫生间和饮用水等设施比较原始,还被设置在户外环境里。幼儿就在这个环境单调陈旧,教学、

游戏以及生活资源相对匮乏的幼儿园中进行着各类活动。20 多年后,幼儿园的硬件环境已和之前完全不一样:园内的主建筑变为了五层教学楼,还配有积木室、音乐室、多媒体活动室等;每个班级都配有带卫生间和盥洗设施的活动室。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幼儿园的硬件设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原始、陈旧走向了现代化。

2.2 幼儿教师的角色:由照看者转变为教育者

20 世纪 80 年代,当时幼儿园被“幼儿园是我家”、“我爱老师像妈妈”的思想浸染,大家都期待老师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给幼儿提供全方位的照顾。当时背景下,没有受过系统学前教育专业相关知识学习和基础技能训练的老师也可以进入幼儿园工作,她们更多承担着“阿姨、妈妈”的责任,为孩子提供全方位的照看。幼儿教师替代家长扮演照看者的角色,去看管幼儿,让家长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安心工作。

20 年后,幼儿园里的幼儿教师普遍更加年轻化,新进的老师基本都有学前教育专业学历,受过专门的、系统的学前教育方面的培养,具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实践能力;幼儿教师承担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老师不再是“保姆式”教育,而是要促进幼儿全方位的发展。

2.3 幼儿的地位:由消极、被动的“容器”转向积极、主动的个体

80 年代中,幼儿园里教师遵循着“教师为中心”的传统儿童观,开展集体教学活动和其他一日活动。在幼儿园的一日生活中,幼儿被认为是需要老师“命令”的,幼儿的所有活动都要在老师的号令下进行,此时,幼儿被认为天生就是一张白纸,需要大人来绘画,进行填充,他们是被填充的“容器”。

2002 年,这种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变。在集体教学活动和游戏中,教师已经表现出尊重幼儿的观点和选择,她们不再是单纯地下命令去安排幼儿,而是观察幼儿,精心启发和引导。如,教师允许和鼓励幼儿在操场自由玩耍等;幼儿也是独立、积极主动的个体,他们的兴趣、需要开始被老师关注到,地位发生了转变。

2.4 游戏的特点:由被安排、被控制转为主动、自由

游戏是幼儿自主、自发进行的活动,不需要教师过多介入进行干涉。80 年代的“大观幼儿园”中,教师却控制着孩子们的戏。在书中研究者以幼儿搭建积木为例:在这样的建构游戏中,幼儿并不能主动地去拿积木,按照教师的要求

端正坐下后,才开始分发积木;积木是一种教学工具,也是一种测量量表,来测量孩子的智商。游戏中,孩子的自主性、创造性被限制,他们没有分工和合作,也没有游戏的喜悦和快乐。

2002年,同样来观察游戏,教师们发现游戏的目的就存在于游戏行为自身之中。他们基于“游戏的教学”、“让幼儿自主学习”和“尊重儿童”的理念,组织建构游戏前,教师会先去了解幼儿的想法,让幼儿自由选择游戏同伴和材料,自主想象、搭建和交流。活动室里不再是压抑、安静和规则,而是充满了幼儿的讨论声、欢笑声,他们在游戏中自由、自主地活动。

2.5 师幼关系:由“教师中心”走向“幼儿中心”

80年代,“教师中心”的观点正影响着我国教育界,教师就是权威,师幼关系当然也不例外。“一切为了教育”、“为了孩子好”意味着教师是代表父母来看管和教育孩子,重点在于“看”和“管”,教师要求幼儿必须遵守幼儿园的规则和日常规。在幼儿园的整个活动中,教师是成人代表,是“权威”,对幼儿进行统一管理;活动中教师的教育以说教为主,是主动方,而幼儿被驯服、被教育,是被动方。

在2002年的幼儿园中,“教师中心”型师幼关系也有了转变,逐渐向“幼儿中心”进发。在幼儿的生活环节如早操、如厕、进餐和游戏等活动中,教师不再是完全的掌控者。同时,幼儿园也要求教师要尊重、理解孩子,与幼儿之间建立起平等关系。教师也要尊重个体差异,每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教师不再是“权威”者,而是幼儿学习和游戏的观察者、参与者、指导者和材料提供者。活动结束后,教师会和孩子分享成功后的喜悦,师幼关系更加融洽、和谐。

3 引发的思考

3.1 文化差异下的课程标准不同

在学前教育中并没有一个适用于全球幼儿园的课程或质量标准。虽然标准化似乎有它自身的道理,可以让我们知道课程该往哪个方向走。但是教育和工厂大批量生产零件一样吗?所有孩子的发展路径是一模一样的吗?答案当然是NO,正是因为观念的多元化,世界的多样化,才让我们的世界变得五彩斑斓,更具有吸引力。早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幼儿园之父”陈鹤琴就曾呼吁以观察实验的方法去研究幼稚园的教学、教材和课程的编订,要建立起适应我国国情的幼稚园,在不违背国情的条件下使用世界上的一些教材教法。如今,中国的“学前人”更需要反思完全崇尚西方、完全照搬西方的行为,我们要合理地借鉴西方教育中的优点,结合我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进行学前教育变革,总结出适合于我们自身的文化理念和方法,创造出适合于我国文化背景的幼儿园教材和幼儿园课程体系。但是要明确,重视传统的文化理念并不意味着要完全回归传统的做事方式,过度的强调“之乎者也”,而是要有选择性,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新的形式出现,来解决新时代的新问题。

文化差异下的课程评价标准是不同的,因此,在利用国外的评价量表对国内的托幼机构进行评价时,像《幼儿学习环境评量表》(ECERS-R)、《0-6岁儿童发展评价量表》

(HIGHSCOPE)等,也要考虑其某些指标是否符合我国文化背景下的国情。

3.2 幼儿教育背后隐藏着“文化逻辑”

中、美、日三个国家幼儿教育各具特色,其实也反映了每个国家所各有的文化逻辑,这种不易改变,但特色鲜明、体现出传承特点的内在见解和做法,即为“隐性文化逻辑”。隐性文化逻辑和一些明文规定的政策不同,它不容易受到监督、批评和改革,而是约定俗成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家中,这种教育方式并不会引起争议。例如,在日本的教育中,幼儿出现冲突时,教师不会过早地进行干预,貌似打架不干预是日本教师的传统,教师通过观察等待,来培养孩子们的移情心,培养他们去解决冲突的能力。面对冲突,教师们可以提供足够的空间和时间给孩子们,最大程度的帮助他们发展社会交往经验和能力。而在美国,教师的态度截然相反,一旦幼儿发生冲突,教师会第一时间进行干预,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师面对同一种情境和事件的处理办法是不同的。

3.3 从比较中进行理性反思

本研究采用了“跨越时间和文化”的比较方法,研究表明,三个国家的幼儿园存在根本不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文化差异。中、日、美三个国家中,中国的改变最大,在上文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介绍。但是我们也有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承,例如,我们强调乐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这些“隐性”文化也体现在我们的幼儿教育中;在我国,集体活动仍居于主导地位;大部分教师的“说教”仍无法改变……在一个文化系统中,各种观念和做法彼此间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并且会互起作用,这个系统中有着属于自身固定的规则。同样,在各式各样的文化系统中,没有哪一种幼儿教育理念是最好的,很多种特定系统的理念可以共存,共同适用,世界上并不存在能完全适用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不同幼儿、最好的幼儿园教育,而是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幼儿都有与其相适应、相匹配的不同的幼儿园教育。我们不应该随意的就拿其他文化中的长处和自身做比较,中国学前教育要做的,是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做现代的中国人”打下基础,培养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 [1] Joseph Jay. Tobin, David Y. H. Wu, Dana H. Davidson. 幼儿教育与文化——三个国家的幼教实况比较研究[M]. 王家通, 周祝瑛, 姜丽娟, 杨景尧, 蔡清华, 合译. 台北丽文文化公司, 1996.
- [2] Joseph Jay. Tobin, Yeh Hsueh, Mayumi Karasawa.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Revisited——China,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 [3] 陈鹤琴. 陈鹤琴全集(第2卷)[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89: 110.
- [4] 约瑟夫·托宾. 学前教育中的文化[J]. 幼儿教育: 教育科学, 2010(11).
- [5] 朴妍香. 从《重访三种文化中的幼儿园》中看人类学思维[J]. 新作文(教育教学研究), 2018, (3).
- [6] 朱家雄. 幼儿园教育中的隐性文化逻辑——学前教育的文化适宜性问题(七)[J]. 幼儿教育, 2015, (25): 4-5.